

学的思想家们都会谈到的“老”问题。而海德格尔的异彩正在于抓住了这一问题的要求,寻找到了二元对象化言说“存在”之树的腐烂之根。这就是在发现真问题的基础上对思想史的重写。然而,历史的重新塑造,文本的重新呈现乃至一个概念、一种方法的重新拼接,都并非靠所谓的“时尚”或流行的新伎俩就能够完成的,它和“接着说”一样都是在首先必须找到问题的前提下的一种理论延续和扩展。

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却存在着一种很令人堪忧的不良风气,尤其是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很多同学由于缺乏对思想史的积淀,将创新错误地理解为对时尚(“当代性”)的盲从,跟随所谓“流行话语”人云亦云。而大量的“学术论文”本身就是对人大复印资料等二手文献群的一个“剪刀加浆糊”的拼贴,不过是将众多对“热点问题”的论述进行一种无内在逻辑的叠加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形成自己具有创新意义的独到见解。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在之前或以后的理论研究中,必然不注重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去关注思想家本身的心路历程,以至于找到真问题所在。

因此,我认为,培养青年学者(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学术上的创造能力,首先在于一种严格的方法论上的训练。即要真正面对思想史线索和前人的提

问,了解前人在问题上的解决程度,从而沿着这一发展脉络进入哲学之门。胡塞尔曾说,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的过程。因而,问题乃至问题系的提出就成了建构一种理论的奠基,这就是创新的逻辑入口。

以近代哲学史为例,康德实际上是接着休谟的经验论提问往下发展的,而他之后的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凡是有所理论创新的地方,无不是解决了前者在有限的生命中试图解决却无力完结的问题。这才是历史在合法基础之上的本真的进展。我们今天之所以提倡一种原创性的“个性化哲学研究”,并不是对大师们外在概念的亦步亦趋,而是要面对思想家本身,寻找到一以贯之的问题在他那里的终结之处,凭借对文本的解读和深入的思考,了解提问以及思想的成因,并通过社会学上的所谓“田野式”的方法路径的布展,进而通达一种具有鲜明的个体特征的哲学之思。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逻辑起点就是在踏踏实实的研究方法的指导下对新问题的发现。

对于今天的中国学者来说,如果理论的发展是一条泥泞而坎坷的路,那么多几分沉稳凝重的步伐,也许更能叩响那扇通向创新的大门。创新,更需脚踏实地的筚路蓝缕之作。

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民俗学百年反思

乌丙安

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教授

近现代民俗学的发端,自1846年英国汤姆斯创造了“Folk-lore”这个民俗学科名称起,到现在已经有154年的历史了。中国引进这门学科的时间,如果从北京大学于“五四”前后创办《歌谣》周刊和成立风俗调查会算起,至今也有80年了。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民俗学交流活动的频繁和青年民俗学者纷纷留学欧美,出现了当代欧美民俗学理论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学说中迅速夹带传来。这些说法形成了两种态势:一是以美国民俗学发生的严重危机造成的影响,即“民俗学既没有自己学科的‘祖先’,又没有自己的理论,民俗学只不过是人类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而已”。于是,因此导致了青年一代“洋”博士纷纷从民俗学转向研究人类学;即使是选定了某些民俗学课题,也郑重宣称是“人类学派”的一种理论研究。一时间,民俗学专业的博士、硕士论文也纷纷大量引用人类学理论,或普遍应用人类学田野作业方法。二是从欧美大量引进

各种现代人文学科的各流派学说和理论;除了译著文本外,较有影响的是青年学者的论著,特别是充满介绍欧美各流派理论的许多译述、述评文本,令人眼花缭乱。其中,除了对20世纪人文学说所进行的清醒反思有某些真知灼见外,自然也带来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论说。这两种理论研究态势对民俗学界的后备军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人转向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并大多采用了民族志的作业方法;一些人不加选择地吸收西方各流派的人文论点,尤其对美国民俗学的现代理论情有独钟,甚至对美国名家一些并无民俗文化依据的浅薄谬误之说也不加审视地予以认同。

90年代末,人文主义的反思几乎与全球化的物质经济生活同步,席卷国际社会科学界。反思人类学针对人类学的认识论及民族志方法论的“异文化”(或异族民俗)研究提出质疑,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所谓“科学性”、“客观性”或漠视被调查对象个性特

征所带来的蔽害,提出了尖锐批评,并指斥了以往人类学中殖民主义对“异文化”及“异族”进行主观臆断的殖民色彩,从而揭开人类学“客观科学”的假面具。这种反思给我国民俗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中国民俗学正好因势利导,从三个方面推动本学科的理论创新。

1 清醒地摆脱以往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民俗学的消极影响与束缚,改变自己的附庸地位,从理论上明辨人类学派对民俗研究和民俗调查的“科学性”是非,从而推动民俗学进行自身的本体、主体或本格的研究,而不是一味地运用相邻学科的多学科、多角度、多方法的边缘研究。民俗学不应再继续走貌似“人类学派”理论研究的蹩脚路,而应当走健康的民俗学自身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推动民俗学成为新世纪的强势学科。

2 清醒地审视美国现代民俗学理论依据及其民俗学对象、范围、分类等的极大局限性和非典型性,用美国民俗文化“传统”移民文化及“现代性”与我国多民族民俗文化传统的悠久性、多样性、稳定性、丰富性相对比,阐释中国民俗学对象、范围、分类等的系统性和典型性,从而确立以中国民俗文化为充分依据的民俗学理论架构。中国多民族民俗资源的典型意义昭示了科学的崭新的民俗理论的推出;也可以说,中国民俗学以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为后盾,有理由争得国际民俗学理论的充分发言权,而不是任意去捡拾不是“他山之石”的石块去攻自己的宝玉。

3 清醒地反思 154 年来国际民俗学对民俗调查研究在认识论上的严重偏向,即把民众的风俗习惯知识与实践的调查研究置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外,以脱离民众及其生活实践的所谓“客观”态度,描写风俗事象、玩赏民俗风情,积累并贮藏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奇风异俗材料。这种只研究“俗”而不研究“民”,只研究民俗事象而不深究其本质的研究,对负载民俗的俗民主体漠然处之,应当指出这种研究的原初在定向、定位、定格上早已出现了偏差,形成了理论上的致命弱点。民俗学调查研究越来越像“民俗古董”(或民俗文物)收集鉴赏的行业行为,不能不

引人深思。

民俗学要不要肩负起解决民俗社会生活中俗民在民俗文化传统圈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的任务,这几乎是不容回避的科学现实。比如,人类世世代代为什么创造了那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民俗符号并为民众所熟悉和惯用,进行信息交流?民俗社会生活是如何构成的?民众的民俗文化素质是如何养成的?民众对于民俗的内化与外化到底有多大弹性?人类个性与民俗的习俗化是什么关系?人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使民俗文化与人类生活的不断变迁相适应的?人类社会为什么要用传统民俗的多种型式“控制”群体和个人?民众为什么要不断地传播民俗甚至创造并发展民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对本族民俗文化表现了特别的尊重并恪守惯制?为什么有些民族又很轻易地抛弃固有民俗转而接受了其它外来民俗等等,所有这些关于人类各民族民俗的重大问题,都需要民俗学自身理论的科学解析并找出合理答案,而绝不是仅仅不停顿地收集民俗民风的资料,或做出生动具体的鲜活的描写、或录制成动人的声像,并以此为学科目的。那种以收集“民俗文物”代替民俗研究的传统应当有根本的改变,把真正的理论建树纳入民俗学实践的迫切日程上来,才是民俗学科意识的真正起点与归宿。

在走向 21 世纪的门槛时回顾国际国内民俗学一百多年来坎坷艰难的旅程,不能不对理论创新做出冷静的反思和评议。无论民俗学在中外各国已经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民俗文化工作不管做得多么红红火火,也无法掩藏民俗学科积压已久的那些令人遗憾的弱点和缺陷。

百余年来,民俗学科在理论与方法方面的贫困和乏力,已经严重地阻碍了这门学科的现代化发展。面对现代产业文化圈与传统文化圈的激烈冲撞和变动,中国民俗学必须在民俗本体理论的创建上有所突破,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其它,别无选择。民俗学人面对这块由几代先驱者开拓出来的民俗学领地,守土有责,在理论创新上应有更大的作为,当稳步跨入 21 世纪时,努力做到无悔、无愧与无愧。

实践是解放社会学的钥匙

邓伟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社会学在中国重建的 20 年,是社会学大解放的 20 年。

没有思想的大解放,便没有社会学的恢复。我清楚地记得,在邓小平 1978 年提出恢复社会学以后,教育部曾发文要求一南一北两所名牌大学率先

建立社会学系,可是这两所大学在当时还是思想很解放的校领导不敢率先建立社会学系。这说明恢复社会学的思想阻力有多么大!曾几何时,社会学系、社会学研究所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这应该说是社会学界思想解放的产物。